

◆ 文化津梁丛书 ◆

近代中国大学校长的文化选择

王 昊 [著]



天津教育出版社
TIANJIN EDUCATION PRESS

◆ 文化津梁丛书 ◆

近代中国大学校长的文化选择

王 昊 [著]

 天津教育出版社
TIANJIN EDUC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近代中国大学校长的文化选择 / 王昊著. —天津: 天津教育出版社, 2010.1

(文化津梁丛书)

ISBN 978-7-5309-5530-7

I. 近… II. 王… III. 高等学校—学校管理—经验—中国—近代
IV. G649.29 G6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07927 号

近代中国大学校长的文化选择	王 昊 / 著	选题策划 / 袁 颖 / 王艳超 责任编辑 / 于长金 装帧设计 / 郭亚非
---------------	---------	---

出 版 人 肖占鹏

出版发行 天津教育出版社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 300051

<http://www.tjeph.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天津泰宇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16 开 (787×1092 毫米)

字 数 176 千字

印 张 11.75

插 页 2

定 价 26.00 元

目 录

第一讲 一座精神的丰碑——蔡元培(北京大学) 001

蔡先生是中国现代大学史上划时代的人物。论功业,既是翰林名士,又是民国元老,更是教育界的泰斗;论道德,堪称学界楷模,近世完人。

第二讲 北大的“功狗”——蒋梦麟(北京大学) 013

被重新发现的北大功臣,正因为他的资格与才具,才能成为蔡元培的北大“替手”,终于将蔡的大学理想付诸实现。

第三讲 心雄万夫的“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胡适(北京大学) 026

处在消费时代中的师生们,其实很难体会得到“良师益友”的真正含义。读读胡适,也许能有让你得到会心的发现。

第四讲 荣辱一身担——司徒雷登(燕京大学) 037

被莫为沟通东西方的文化使者的他,曾从超越东西方的角度出发从事文化的传播与交流,然晚景不佳,在中美两面弄得都讨好,颇令人割爱。

第五讲 大学一解——梅贻琦(清华大学) 049

恂恂一儒者,没有洋博士的头衔,却令清华的洋博士们佩服得五体投地,在近代中国大学史上也许没有第二人能与之比肩。遥想当年,其风采足令人神往。

第六讲 清华、中央各千秋——罗家伦(清华大学、中央大学) 061

五四健将、“新潮”领袖,但并不一味追求“思想的破坏”,而是极力提倡一种负责任的思想,在他的身上始终充盈着中国知识分子的道义与责任。

第七讲 点燃中国奥林匹克梦想之火——张伯苓(南开大学) 073

此乃追梦人,一生以追求完美的教育为鹄的,完美非只求教育体系的完整,更表现为追求育人的至善至美,即培养具有健全人格和健康体魄的人。

第八讲 问政复问学——何廉(南开大学) 085

毕竟是书生,十年宦游,最终回归学术之路。其实早在仕宦之前,他已经在中国现代经济学领域里独领风骚,开创了赫赫有名的“南开学派”。

第九讲 尽瘁于教育与学术——陈序经(岭南大学) 098

坚定地拥护并提倡“全盘西化”,看似偏激,实乃源于对民族与中华文化的“爱之深、责之切”的本心,对此无深刻了解的人,实难体会。

第十讲 台大岁月——傅斯年(台湾大学) 110

所谓“大气磅礴”的一代学人,论学,眼高,手则未必低,后人能有所超越者,鲜矣;做人,则激浊扬清,风骨凛然。

第十一讲 大儒办学——钱穆(新亚书院) 123

天下谁人不识君,后人誉之为“中国最后的国学大师”。学问,一无两;育人,亦可圈点;但论及性格,则褒贬不一,是耶?非耶?

第十二讲 有声于东南——郭秉文(东南大学) 135

师范教育的重要性,虽无人否认,但却长久地受到忽视。他力图矫正之,其“寓师范于大学”的思想和初衷至今依然超迈于时代和我们对师范教育的认识。

第十三讲 巾帼不曾让须眉——吴贻芳(金陵女子大学) 147

近代中国,华人女校长不少,可是能出掌一所大学者却少之又少,她以女性特有的气质和风范影响了近代中国女子高等教育的走向。

第十四讲 与复旦共始终——李登辉(复旦大学) 159

李登辉:没有马相伯,就没有复旦;没有李登辉,复旦亦不可想象。可现在除了复旦人对老校长略有所知外,世人对其知之甚少。当然,此李非彼“李”,同名而已。

第十五讲 流离中创造的大学奇迹——竺可桢(浙江大学) 171

匠心能以素为绚,足可以用来形容竺可桢主政浙江大学时的功业,浙大人至今都应感念竺氏,在天时、地利均处劣势的环境中,凭借人和振兴了浙大。

第一讲 一座精神的丰碑

——蔡元培(北京大学)

蔡先生是中国现代大学史上划时代的人物。论功业,既是翰林名士,又是民国元老,更是教育界的泰斗;论道德,堪称学界楷模,近世完人。

蔡元培先生去世后,蒋梦麟评价他“精神不死,是谓不朽”。的确,先生的人格和精神是伟大的,其魅力超越了时空,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直至多年后,他的学生提起他时,竟都“老泪纵横,情不能禁”。不能不承认,先生的思想超越了他所处时代和社会,从“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提出,到对“教育独立”的呐喊,无不体现了他对教育的美好愿望和真切关怀。先生所处的那个时代,教育不能不受到政治和经济的制约,所谓的“教育独立议”终究只是纸上谈兵。不过,对于教育,人们需要一种“乌托邦精神”,唯有如此,才能维系世间对教育的一线希望。时至今日,每当我们对当代大学的走向和价值取向产生疑惑和争论的时候,不同营垒的人们都会向蔡先生寻求思想的支援,以至于世人至今还在争说蔡先生。尽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作为经典性的大学指导思想还未能在制度上得以全面确立,但我们相信:希望常在,大学美好的未来为期不远。

后人讲:“以口为碑,所以蔡先生的事业会代代相传;以心为碑,所以蔡先生的精神才更感人至深;以文为碑,所以蔡先生的公德会寿于金石而不朽。”一个人的人格精神能长久地左右社会人心,足以证明这个人的伟大。

试为先生画像

翻看清末民国时期的人物旧影,总觉得国人不同程度地带有“病夫”相,猥琐、无神,说不上干净利索,更不要提精气神了。不过,有些旧时影像还是能引起人们注意的,这些影像大体集中于教育界、外交界、文艺界、军政界要人和社会名流。翻看这些能给人以不同感觉的人物照片,总觉得近代中国文化教育界名人的影像要比那些政客、武人耐看。每每回顾中国近现代教育史,尤其是大学发展史,总会情不自禁地对当年大学校长与教授们的音容笑貌和个人风采展开想象。真实的影像与想象中的形象虽不免会有落差,但想象和现实中的大教育家之气度和气韵应是大致不差的。影像和文字都是具有魔力的东西,文字的魅力要通过理解、融通方能感受到,而更为直观的照片则能缩短想象与现实的距离。每见蔡先生的留影,总能发现其嘴角上挂着的一丝柔柔的笑意,眼角眉梢都似笑,那江浙文士的儒雅气质与谦谦君子之风尤让人觉得可亲可敬。

凡是与蔡先生有过接触的人大都提及他的待人接物,谦和、冲淡、平易,如此平淡的一个人,却给学生与朋友们留下了深深的印象与无尽的怀念。很多人对蔡先生的印象并非是在所谓重大的历史事件中留下的,而多是来自对蔡先生交友往还的细微观察。蔡元培第一天到北大上任的情景,尽管已没有什么影像资料可以追寻,但是顾颉刚在回忆中还是给后人勾勒出蔡先生当日一个清晰的身影。“校工们排队在门口恭恭敬敬地向他行礼,他一反以前历任校长目中无人、不予理睬的惯例,脱下自己头上的礼帽,郑重其事地向校工们回鞠了一个躬,这就使校工和学生们大为惊讶。”就是这样一个普通却极为恭敬的回礼,让人们感受到的是蔡先生待人的平等及友爱,没有半点做作与矫情。

北大的人,不论师生员工,均称蔡元培先生为“蔡先生”,反映出北大人对于先生的景仰和热爱。多少年来“蔡先生”已经成为北京大学校园内一道永恒的风景。在人们的心目中,蔡先生的人格形象已经化作一座精神的丰碑,永远留驻在人们的心底。

蔡元培先生是怎样的一个人?虽然后人赞誉、评价多多,实际上,纪念性的文字大都是对先生伟大人格加以不同方式的肯定而已。但其中,罗家

伦的评语颇为精练、深刻,他称赞道:“如大海容纳众流,不厌涓滴,是先生的包容。汪汪若万顷之波,一片清光,远接天际,是先生的风度。慈祥恺悌,谦光中流露至诚,是先生对人的感化。‘柔亦不茹,刚亦不吐’,是先生的风骨。”也许,语言和文字不足以形容蔡元培的伟大和崇高,但是我们还是要用简单的笔墨为先生留下一笔写照。

风骨。1922年10月,北大因经济方面原因,采取改革措施,其中规定向学生征收讲义费,不料此举竟然引发了一场学生直接抵制学校当局的风波。当月17、18日,学生代表数十人先后到会计课和校长室请愿,要求校方撤销征收讲义费的校令,蔡元培向学生解释无效,双方形成僵局。当时,学生们气势汹汹,意欲罢课,并将矛头对准了事务主任沈士远。面对欲行暴力的学生,蔡元培奋身而起,厉声制止,直面对着声势浩大的学生。他坚持校纪,表现出一股不屈之勇。当众学生呼啸着还要求沈氏的时候,蔡元培大声呼道:“我是从手枪炸弹中历练出来的,你们如有手枪炸弹尽不妨拿出来对付我,我在维持校规的大前提下,绝对不会畏缩退步!”爱护青年,但绝不纵容青年,是蔡先生对待青年的态度。面对着学生们无理的要挟,先生柔善的外表下竟充溢出一股刚劲不挠的气概,令在场者纷纷后退。

道德。蔡元培尝言:“责己重而责人轻,乃不失平等之真意,否则迹若平而转为不平之尤。”在旁人看来,“蔡先生平时待人,对好人没有不尊敬;对坏人,也没有不宽恕”的。一个人的高尚与卑劣不只依凭着文字来反映,述及蔡先生道德的文字固然声情并茂,粲然可观,但其人格感召力却是通过几则小故事体现出来的。唐振常先生曾讲,1979年王芸生先生受托主持全国政协召开的征集蔡元培资料的会议,出席会议者皆蔡元培的学生与友人,其年龄均已耄耋,一提蔡先生,座中皆老泪纵横,情不能禁。巧的是,就在此前一年,1978年5月7日这一天正午,香港仔华人永远墓场,“在正午之阳光下,蔡先生墓前闪耀着一片美丽的银灰色,在这许多白发先生当中真正亲炙过蔡先生的恐怕都已是八十过外的老人了”,这些旅居港台的老北大人是为参加蔡元培新墓落成而来的,“旅港北大同学则每年举行春秋二次拜祭,以追思他们的故校长,但一切都是很平静的”。无须多言,先生的人格感召力依然绵绵。

清廉。蔡元培在世的时候,凡与他有所接触的人,都能感觉到他清廉退

让的种种美德。1940年,蔡先生因病逝于香港,当时任鸿雋曾致胡适一函述及先生的晚境,“蔡先生真是今之古人,所谓不事生产,家无余储,老先生皆见诸实行,所以他死后家中的生活便立刻发生问题”。确实,蔡元培在六十岁前,身为国民党元老和教育文化界的领袖,竟然连“徒四壁”的房子都没有。所谓“其非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乃蔡元培为人处世的准则。

冷峻。先生不轻易喜怒,但对于社会上种种陋习和腐朽风气自有明断。有掌故云:北大同学会曩在京中,每逢五月四日必盛宴同学而奉先生为上座,年年如此,先生颇惫苦之,一次戏语邻座曰:“吾辈此日真成吃‘五四’饭矣!”当时,一座哑然。蔡元培看问题和做事情如此“到位”,吃“五四饭”一语破的,有如当头棒喝,促人猛醒。此一小节,足可发人深省。

短短几笔,不能详尽先生的人格和品质,但亦足矣。生前恬淡自守,身后平静如水,却足堪“伟大”二字的评价。蔡先生歿后数十年,依然魅力不减,研究蔡元培者遍及海内外,成果亦不可胜数。“历史不能忘怀他”确非虚言。

大学之道

蔡元培对近现代中国的巨大贡献当在教育,其对大学的贡献尤为突出。出掌北大之前,蔡元培便对如何办理大学有了比较成熟的思考。赴任之前,蔡氏两度游学德国,在莱比锡大学学习。期间他虽没有选修有关教育方面的课程,但却时时留心考察德国的大学制度,体察德国先贤的大学思想。后来,蔡的学生罗家伦在回忆中提到,“对于大学的观念,深深无疑的是受了19世纪初建立柏林大学的冯波德(今译洪堡)和柏林大学那时代若干大学者的影响”。显然,近代德国因教育而走上强国之路的历史经验给了蔡元培以精神上的鼓励,他相信大学和学术的发达是一个民族走上富强的根本,所以他的心中始终涌动着“切实从教育着手,未尝不可使吾国转危为安”的热切渴望。

如果说,作为民国首位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在考虑大学教育规划的时候,还只是在宏观的层面考虑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及其走向的话,那么,五年之后,当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那一刻,他心目中的大学不只是形象上的

清晰可辨,更有一幅未来大学的远景图画在心中铺展开来。大学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蔡元培在就职讲话中开宗明义,首先回答了何谓大学这个问题。大学,不是行政机关,不是官场,不是商场,不是政治的工具。“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定宗旨,欲知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必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主政北大,是蔡元培教育事业辉煌的开始。在校长任内,他所从事的高等教育改革不仅使北大成为学界竞相效仿的成功典范,他本人也获得了极高的赞誉。蔡元培的教育事业虽并非仅仅局限于北大,但若没有北大这一段经历,蔡先生的大学理念似乎不会被发挥得如此淋漓尽致。在中国大学发展史上,蔡元培之所以能够奠定不拔之基,不单单是将一个老气、官气充盈的北大改造为现代中国思想与学术的中心,更在于他一举奠定了中国大学百年来的基本品格和内涵。

梁漱溟曾评价蔡元培道:“蔡先生一生的成就不在学问,不在事功,而只在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梁氏此番议论,着眼于蔡元培在思想上的贡献,固然评价不差,但论蔡氏成就“不在事功”,则未必尽然。毕竟北大的教育改革即是其成功的事业。因为先有了制度上的转变,才可能触及风气的变化。从现代意义的大学体制而言,蔡元培在北大的改革主要集中于教学体制和行政管理的一系列举措。就任校长之前,蔡氏曾致函老友吴稚晖,表达了要将北大改造为“纯粹研究学术之机关”的意愿。纯粹学术研究机构的目标看似简单,实际上蕴涵了多种制度改造的设想,其中当然包含着对教师选聘、学科规划、教学科研管理等一系列改革的具体认知。

开展学术研究的基础,当有充足的设备和学者,需选聘有真才实学、高水平的教师,以满足学生求知欲望,进而才能诱发其对研究问题的兴趣,最终达到培育良好校风、提高教学质量的目的。教师的甄选又自然会触及大学科系的设置。初掌北大,蔡元培对学科的调整是其贯彻大学观念的反映。他始终认为“大学是研究学理的机关,对于纯粹学理的文、理科,自当先做完全的建设”。缘何偏重文、理两科,实乃现实因素使然。蔡元培认为,清末以来,人们受科举影响,对法、商教育趋之若鹜,很多人抱定了上学是为了升官

发财的目的,风气所及往往导致学生们不能安心于学业,而此种风气对大学的影响尤甚。所以,蔡氏极其注重对基础学科的建设,强调学为基础,术为支干,“文、理,学也。虽亦有间接之应用,而治此者以研究真理为目的,终身以之。所兼营者,不过教授著述之业,不出学理范围。法、商、医、工,术也。直接应用,治此者虽亦可有永久研究之兴趣,而及一程度,不可不服务于社会。转以服务时之所经验,促其术之进步。与治学者之极深研究,不相侔也”。蔡元培这种重视文理科的思想,对北京大学后来的学科发展影响至深。然而,也有研究者指出,因为蔡元培深受19世纪德国大学观念影响,结合于中国传统教育及“鉴于当时须革除科举余绪,对职业与教育的关系未能做出观念上的阐释和实践上的重视,以致在大学观念上出现偏颇”。事实上,当年已有不少学者对蔡元培的北大改革提出了不同的看法,甚至是批评。蔡先生去世后,人们在怀念起他的时候,对他在北大时的作为还评判不一。“一般人对于蔡先生在北大的工作,至今似乎还没有一致的评价”,正是这一现象的反映。当时,有的人从普通教育的视角观察北大改革,认为北大的成就不算特别优异。不过,时人在北大引领思想方面的认识却异乎寻常的一致,“从思想的革命方面去评量北大,北大的成就,不是当时任何学校所能比拟,也不是中国历史上任何学府能比拟的”。其实,因为有时代、环境及学识上的局限,所以当时人们对大学的思考必然千差万别,今天的人们对大学的理解尚且仁者见仁,何况前辈。

需要指出的是,蔡元培对北大改革的基本思路大体仿照欧美大学观念及制度,其中心的主旨便在于“学术至上”和“教授治校”。在这种观念指导下,他将北大工科归并于北洋大学,取消商科,改为商业学门归入法科。鉴于预科与本科的脱节,将预科分别归属各本科统一管理,以求一致。经过调整,北大以原有经费集中加强文、理等科,对基础学科的教学和研究起到了加强作用。此后,北大以学分制取代年级制,促进了教学质量的提高。在行政管理上,蔡元培改变校长独大的传统,全面推行教授治校体制,成立由校长、各科学长和教授组成的评议会,作为全校的最高决策机构,领导校务;各学科建立教授会,负责规划和组织各科教学研究活动;再后来,学校相继设立教务长、总务长等职,均由教授出任。“教授治校”的本意,是将校长权力下放,交由教学及学术研究的主干人员自行管理,从而达到教学与治学的合

理状态。

制度的健全为思想的开放提供了保证,被后人津津乐道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大学理念,如果没有制度作为依托,很可能会流于空想。在“学术至上”和“教授治校”原则的引领下,北大成为一所名副其实的“囊括大典,网罗众家”的学府。不同学派的学术思想、中西文化的各种观念和阐释在北大校园中交锋,相映成趣。是时,你能在校园里看到时代的精英,如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人,也能领略国学修养极深的黄侃、吴梅等大师的风采,亦能发现辜鸿铭、刘师培那样政治上极其保守的人物。各种各样的学术思潮在北大校园中跌宕起伏,在这涌动着的思潮里孕育着近代中国启蒙思想的种子。其时,方兴未艾的新文化运动“由实行‘兼容并包’的北京大学辐射于九州方圆,形成近代中国第一次百家争鸣的活跃局面,学术文化风气由此为之改变”。蔡元培对北大的改革固然从制度层面为中国现代大学制度提供了范型,其更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则是,蔡氏将其对于大学的理解,即大学之道贯注入大学制度,使其成为一而二、二而一,浑然一体。大学精神不能游离于大学制度之外,否则便成无本之源;大学制度也不能没有大学精神的依托,否则就是“行尸走肉”,枯槁一副。近代西方现代大学理念中的学术自由、教授治校、通识教育之类的基本价值和准则,经蔡元培的播撒,顿使一所官衙气、陈腐气四溢的老北大一变而成为具有独特风貌、以民主和科学新面貌示人的新北大。美国教育家杜威评论蔡元培,称如果将其与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相比,从个人对学校的贡献这个层面讲,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等校校长的卓越成就并不在蔡元培之下,但如果说“以一个校长的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对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了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到第二个”。

“教育独立”的思想脉络

教育独立思潮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知识界为谋求教育发展,实现对现实教育的改造,使教育保持独立地位,免受政争影响的思想潮流,其直接起因于军阀政府摧残教育和教育经费严重不足这一现实。这一思潮滥觞于五四运动之前,成熟于五四运动之后,以李石岑发表《教育独立建议》和蔡元培发表《教育独立议》为标志。其实,民国以来,蔡元培教育理念的发展呈现出

一条十分清晰的“教育独立”的思想脉络。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在蔡氏的思想世界里,谋求教育与学术摆脱政治的羁绊,并不是单纯地主张教育脱离现实的政治,而是希望通过对教育独立的争取,而使教育的独立使命能在合理健康的制度下得以顺利实现。早年,作为民国首位教育总长,蔡元培全然不顾党派之分,力请教育专家、共和党人范源濂出任次长,一本其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中所坚持的“教育应当超轶政治”的观念,疾呼“现在是国家教育创新的开始,要撇开个人的偏见、党派的立场,给教育一个统一的智慧的百年大计”。及至出掌北京大学,蔡元培更是将自己对大学理念和制度的统一落实于实践层面,遵循着学术至上和大学自治的理念,着力营造北大思想自由的氛围,对教学科研和行政体制的调整、对“教授治校”原则的贯彻等等,无不促进了北京大学改革的顺利进行,并很快彰显出积极的效果。“教育独立”从制度和观念两个层面上讲,无疑是人类追求自由事业的产物。捍卫“教育独立”不单单是蔡元培口头上的说教,在行动上便以其敢于笃守自由理念来对抗当局的滥用权力而反映出来。1923年,北大兼职教员罗文干遭军阀政客集团的诬陷而蒙冤入狱,当时的教育总长彭允彝于其中充当了极为不光彩的帮凶角色。目睹种种政治阴谋和所谓教育人士的卑劣行径,蔡元培拍案而起,对北洋政府践踏教师权利的行为大张挞伐。在被后人誉为“近代中国最直率、最能体现知识分子气节的”辞职书中,蔡元培质问当局,“最可异者,钧座尊重司法独立之命令朝下,而身为教育最高行政长官之彭允彝,即于同日为干涉司法独立与蹂躏人权之提议,且已正式通过国务会议,似此行为,士林痛恨”,他自己更表示“虽职有专司,然国家大政所关,人格所在,亦不敢放弃国民天职,漠然坐视”。蔡先生所作所为无疑向世人宣明了他对于“教育独立”之自由精神的坚守,不仅是理论上的阐发者,更是行动上的捍卫者。

1923年罗文干案发生后,蔡元培对北洋政府采取“不合作”主义,愤然辞职,远游欧洲。此后几年,国民革命运动蓬勃高涨,北洋政权日薄西山。1926年2月,自欧返国的蔡先生在参加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及政府工作时,联络李石曾等同仁提出了成立大学院并试行大学区制的主张,将心仪已久的争取“教育独立”的理想付诸实践。作为该制度的创始者,蔡、李诸人曾旅法多年,深受法国教育学说的影响,并倾心于法国的教育制度。在他们看

来,中国教育长期以来深受政治腐败之影响,不仅教育行政不良,而且学校的学术及教学质量也大有江河日下之势。出于改革教育行政和变教育官僚化为学术化的目的,蔡等人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提出了变更教育制度的议案。1927年6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了《试行大学区案及组织条例》,同月又通过了《大学院组织法》。大学区制首先在江苏、浙江两省试行,准备渐次推向全国。大学院与大学区制是以蔡元培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希望借助新政权的力量,把民国教育纳入现代民主、自由轨道的一种尝试。实际上,这一教育独立的蓝图,蔡元培早在1922年《教育独立议》中就将其详尽地阐发过了。当时,蔡先生已对实行超然的教育,拟出了办法:

分全国为若干大学区,每区立一大学;凡中等以上各种专门学术,都可以设在大学里面,一区以内的中小学校教育,与学校以外的社会教育,如通信教授、演讲团、体育会、图书馆、博物院、音乐、演剧、影戏……与其他成年教育、盲哑教育等等,都由大学办理。

大学的事务,都由大学教授所组织的教育委员会主持。大学校长,也由委员会举出。

由各大学校长,组织高等教育会议,办理各大学区互相联系的事务。

教育部,专办理高等教育会议所议决事务之有关系于中央政府者,及其他全国教育统计与报告等事,不得干涉各大学区事务。教育总长必须经高等教育会议承认,不受政党内阁更迭的影响。

.....

综上而观,倡行大学区与大学院制的努力,真实地落实到了要求教育经费独立、立法独立、人事独立等行政层面,蔡氏所希望的以学术指导行政,学术高于一切,意在改变北洋时代官僚化的教育体系,为中国教育开创出新的契机,其动机纯良,行动有力。可是,大学院与大学区制试行的时候,也正值国民党政权宣布实施训政之时。是时,国民党提出“以党治国”的口号,强调“军政统一”“思想统一”,而大学院和大学区制的组织原则又与国民党党治精神相抵触,所以当时国民党内部对此反应强烈。当党内人士对大学区制提出“在此党政合一时期,望对民众担负责任,领导训政,而政治制度不能遵照最高党部之决议推行,徒以未暇指定,苟且存在,殊属不合”等反对理由的

时候,试行大学区制的江苏大学区内中等学校教职员联合会亦发表宣言,称“盖以现社会实情言之,则学术之空气未浓,而官僚之积习方深。以学术机关与政治机关相混,遂使清高学府,反一变而为竞争逐鹿之场”。此种情形大大出乎蔡元培的意料,不久由北平大学区引发更大的风潮,影响既烈且远。1929年夏,国民政府不得不宣布停办大学区,大学院随即改为教育部,蔡元培教育独立的制度努力终究还是化为泡影。不过,教育独立的理想显然并未因制度的废立与否而破灭,1930年在为《教育大辞书》写作“大学教育”词条时,“教育独立”的理想依然跃然纸上。“近代思想自由之公例,既被公认,能完全实现之者,却唯大学。大学教员所发表之思想,不但不受任何宗教或政党之拘束,亦不受任何著名学者之牵制。苟其确有所见,而言之成理,则虽在一校中,两相反对之学说,不妨同时并行,而一任学生之比较选择,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

其实,国民党以党治国的政权形式确立以后,教育就不能不被政治所影响,教育的宗旨、政策、教学内容等无不随政治的变化而变化。政治健全了,教育才能健全,这应该是现代教育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值得肯定的是,蔡元培等人为中国的“教育独立”所付出的种种努力,正是秉承了学术自由的大学精神传统,在力主教育摆脱政治羁绊的原则指导下,从人类传承理想、守护精神、谋求发展的高度着手,以期为民族和国家的文明强盛奠定坚实基础。尽管这一实践不过是个玫瑰色的梦,但正是大学的独立精神构筑起了大学之魂。正是这种大学之魂,“使大学在贯穿整个人类历史的创造与毁灭两种力量无休止的冲突中始终代表着创造的力量,在人类苦苦追寻理想的过程中,大学则既是人类在意识中进行伟大探险的先锋,也是世代代人类赖以支撑的理想和精神价值的守护者”。

大学精神的嬗递,往往与作为精神领袖的校长关系莫大。当下中国大学被人谑称为“失魂的大学”,即批评中国大学精神的丧失,而大学精神的丧失固然与体制上的原因有关,但作为大学领导核心的校长,其精神气质、胸襟眼光和任事的勇气也影响着大学精神的凝铸。民国时代的教育体制不甚理想,却因为有了蔡元培等对大学有深刻理解的校长,大学的教学和学术研究才能得以循着理想的路径缓缓前行,尽管速度很慢,但成就昭然,所以那时的一些大学能与世界著名大学并驾齐驱,也不会为了去争所谓的世界一

流而鼓噪呐喊,大做表面文章。学者丁国强的一段评论似可作为本文的总结,“孤独的大学是纯粹的精神殿堂,它不仅仅为教育而存在,而且构成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灵魂。五四文化启蒙运动是孤独者的呐喊和呼唤,如果孤独者从此放弃了独立的精神品格,启蒙便成了空话。大学仍然需要孤独下去”。

[参考文献]

张晓唯:《蔡元培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陈平原、郑勇编:《追忆蔡元培》,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

蔡元培:《蔡子民先生言行录》,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郑勇:《蔡元培影集》,山东画报出版社,1998年版。

金耀基:《大学之理念》,三联书店,2001年版。

萧雪慧:《教育:必要的乌托邦——萧雪慧教育随笔》,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丁东、谢泳、高增德、赵诚、智效民:《思想操练》,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张晓唯:《今雨旧雨两相知——民国文化名人史事钩沉》,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

丁国强:《九议大学精神》,载夏中义、丁东编:《大学人文》第五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附录:蔡元培小传

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号子民,浙江绍兴人,教育家、学者、政治家。

蔡元培早年接受传统教育,1892年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1894年补翰林院编修。中日甲午战争后,开始接触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学习外语。1901年赴上海任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1902年参与创立中国教育会任会长,后参与创办爱国女学和爱国学社。1904年冬,与陶成章等在上海建立光复会,被推为会长,次年加入同盟会。1907年6月赴德留学,入莱比锡大学攻读哲学、心理学、美术史学等课程。

辛亥革命成功后回国,1912年1月出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发表